

胡耀邦会见许贞淑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中朝两国人民继续风雨同舟发展友谊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今天上午在中南海会见了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副议长许贞淑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友好代表团。

会见时，胡耀邦愉快地谈到了中朝两国领导人

不久前会晤的情况。他说，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唇齿相依、风雨同舟的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中国的土地上洒下了朝鲜人民的鲜血，朝鲜的土地上也洒下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建国后，我们两国人民同舟共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信赖、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关系。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风雨，世界上有人妄图干扰我们两国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各自主权的祖国，因此，我们要继续风雨同舟。胡耀邦祝愿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将世代传下去，而且这种友谊和团结将对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许贞淑在会见时谈到了代表团访华的观感。她说，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立于不败之地，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此，我们要继续风雨同舟。胡耀邦祝愿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将世代传下去，而且这种友谊和团结将对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民，外交部顾问韩念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金宗荣等出席了会见。



胡耀邦主席会见许贞淑副议长，图为宾主步出会客厅。新华社记者摄

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说
解决群众中思想问题要依靠社会科学
从理论上作令人信服的解剖明辨是非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李蔚、新华社记者李洪后报道：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指出：解决人民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如同解决社会进步中的理论问题一样，要依靠社会科学。他勉励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当前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的，一些思想上的疑难和迷惘，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外来的，要从理论上作令人信服的深刻的解剖，帮助渴望求知的读者明辨是非，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力武器。

胡乔木是在5月18日结束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这一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虽然“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应该取得的成就推迟了，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理论战线新起的力量，成长得比预料的还快。只要大家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和勤奋勇敢的态度，就一定可以期望得到更大的进步。

座谈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于5月13日召开的。来自北京、上海、云南、甘肃、广东、福建等13个省、市的43名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出席了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內容、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学术见解。

大家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科学战线青黄不接的情况相当严重，必须一方面努力为老学者从事研究、著述和传授专长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努力鼓励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的的工作，帮助他们克服进行工作和发表成果的困难。

著名学者周扬、于光远同志也会到会上讲了话。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与会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正在文艺领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与此同时，目前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不可忽视的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企图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承认它的伟大理论贡献和对当前文艺事业的巨大指导作用。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理论领域的表现；另一种倾向则是无视历史，回避现实，继续采取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态度，盲目地坚持“句句是真理”，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不断发展、继续前进的必要性。因此，为了前进，我们必须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他们指出，今天的现实条件和四十年前《讲话》发表时已经大不相同了。特别是当前新时期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我们应该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下转第四版)

在四化建设中成绩卓著
北京15名厂长当选劳模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在四化建设中作出卓越成绩的北京市15名工厂厂长，最近被评选为1981年度市劳动模范。

北京市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厂长当选为市劳动模范。他们熟悉管理业务，懂技术，是组织指挥生产的行家。北京汽车配件厂厂长、工程师范亮，采用专业化协作的办法把总厂所属的小厂组织起来，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出产品。一年的时间就使汽车千斤顶的产量增加了13倍，质量超过了外商提出的要求。由于客商纷纷订货，这个厂去年出口产品换取的外汇，约占北京市机械出口换汇总额的四分之一。

评选为市劳动模范的15名厂长中，有些同志在生产、科研方面有所创造。

不能混淆劳动致富和投机倒把活动的界限
张相恒劳动致富值得表彰岂能打击

南漳县通报批评三景管理区错批劳动致富户，号召大家向张相恒学习

本报讯 3月22日，湖北省南漳县三景管理区党总支主要负责同志，在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开展家庭副业劳动致富的三景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相恒，混淆了劳动致富和投机倒把活动的界限，引起了很大反感。

张相恒全家6口人，4个劳力。去年，他利用工余时间种天麻26亩，收入1,650多元，加上集体分配和其他副业收入，总收入达2,360多元，在全公社“冒了尖”。张相恒自己富了，不忘大家，积极宣传天麻的好处，先后向前去采种、学习的300多人传授了天麻培育技术。对本队、邻队的10多户困难户，他分别赠送了菌棒、天麻种，并亲手帮他们点种。他不忘国家，首先还清了200元的国家贷款。有人劝他把三间破房子（有一间平房顶是用石片盖的）撤了重盖，他说：“我有了钱不能乱花，存起来支援国家”，当年存款800元。

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是全大队干部群众公认的。去年他完成了党支部分配的公作，自己承包的责任田也得了超产。今年2月初，经大队、管理区推荐，公社党委研究，树张相恒为全公社“致富模范户”；2月中旬光荣地出席了县劳模代表大会，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地区农业系统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经验交流会。公社和管理区通过宣传张相恒这个典型，对全公社开展劳动

致富、发展天麻等副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三景管理区党总支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深刻理解，“左”的余毒没有彻底肃清，错误地把劳动致富同个人劳动致富对立起来，把农村出现的不良倾向归结于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把中央批准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精神理解为“转向”、“纠偏”。为了“震动大点、煞住歪风”，在3月22日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采取实物“亮相”与点名批判的办法，批判张相恒所谓“低价买、高价卖天麻

的积极性，而且引起了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了误解，使那些本来在致富问题上就心存余悸的社员认为党的政策又变了，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南漳县委严肃地指出了三景管理区党总支的作法是违背党的现行政策的，并帮助他们认识了错误，吸取教训。公社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三景管理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为张相恒恢复了名誉，肯定他靠劳动致富的路子是对了的，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管理区主要负责同志也主动找张相恒谈心，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鼓励他继续当好劳动致富的带头人。（张瑞友）

东南三个含油盆地，为今天中外瞩目的南海石油开发事业在地质资料方面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行新的探索，从去年开始，他们进行了南海至东海的大剖面联测，包括台湾浅滩的地震踏勘；首次取得了西沙和中沙附近海域的大量地球物理资料，对在南海北部大陆架找油提供了新的场所，对南海陆坡边缘和深海盆的地质面貌有了新的认识。

目前，这个指挥部的海洋2号地质调查船，已从珠江口拔锚，正在远离海岸的南海海域为完成新的一年任务和待海捞舰。

地质矿产部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
向南海地质新领域进军获得成果

本报讯 记者王天铎报道：为开发我国南海石油事业建立了功勋的地质矿产部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为进一步寻找石油资源，正向南海地质新领域进军，并获得新的成果。

这支南海地质调查队伍，从1970年建立以来，在南海北部3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里进行了系统的以石油为主的海洋地质调查。他们先后发现和圈定了北部湾、珠江口和琼

中国文联、文艺所联合召开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提出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精神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引导我国革命文学艺术事业前进的指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学习它、运用它，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不发展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坚持。目前，还要继续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属于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普遍原理，哪些是属于阐述或执行中产生的偏差，特别要把“左”倾思潮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由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5月6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京的部分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者、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师、专业作家共80余人。

中宣部顾问、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到会讲话。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峰、文化部顾问林默涵出席了会议。陈荒煤、冯牧、许觉民主持了讨论会。

到会同志阅读了胡乔木同志最近在《文艺报》重新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文，就如何科学评价、正确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确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同志其他的文艺

保护勤劳致富的农民

本报评论员

最近在农村少数地方，出现了混淆劳动致富和经济违法活动的界限，打击甚至批判辛勤劳动致富农民的不正常现象。今天报道的湖北省南漳县三景管理区批判搞家庭多种经营致富的农民张相恒，就是一例。凡是发生这类事件的地方，党的农村政策的继续落实受到了干扰，农民思想出现混乱，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这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在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的鼓励下，这几年各地农村都涌现了一批勤劳致富的农民，即过去人们常说的“冒尖户”。这个称呼的含意不够准确，容易引出一些不正确的解释，因此现在有些地方已改称为“勤劳致富户”或“劳动致富户”，这就比较确切了。这些农民热烈拥护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坚持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有的承包集体的农牧副业，有的发展家庭副业和专业生产，有的从事各项为党的政策所允许的生产事业。他们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国家和集体增加了财富，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比较快地由贫困走向富裕，对广大农民发展生产起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为什么有些地方出现打击辛勤劳动致富农民的事情呢？有那么一些人，“左”的思想还在头脑里作怪。他们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政策，心里还是犹疑不定，对目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管理区认识不清，一有风吹草动，就习惯地走老路。南漳县三景管理区批判发展家庭多种经营致富的农民张相恒，竟召开了千人以上的群众大会，把张相恒点好白木耳菌种的黄莲树抱到会上示众，大有“掏鸟窝子”、“割尾巴”卷土重来之势。县委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批评、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

有些人加给勤劳致富农民的罪名之一是“只图个人发财致富”，说“我们只能提倡集体致富，不能提倡个人致富”这种把集体致富与个人致富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与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精神违背的。三中全会提出，要允许一部分条件好的地方加速发展生产，先富裕起来，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同样的道理，也应当允许一部分条件好的农民先富起来。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实现富裕的过程中，总是有先有后。这几年农村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总的说，广大农民的生活都有了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改善的程度有差距。许多事实证明，个人致富与集体致富是互相促进的。农民张相恒种天麻，养白木耳，喂猪羊，发挥了个人的专长，去年总收入2,360多元，在全公社“冒了尖”。他向周围300多人传授培育天麻技术，帮助困难户发展副业生产，使他的技术经验成了众人的财富，不少社员也都增加了收入。象这样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勤劳致富的农民，怎么能说是“投机倒把”，而加以大批大斗呢？这样的农民，不是越多越好吗？

不少农民和张相恒一样，是利用家庭多余劳力，发展多种经营勤劳致富的，这是党的政策所鼓励的。党中央一再指出，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必须坚持集体、个人一齐上，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正确政策。最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又指出：“现阶段，多数地区，很多项目应主要靠农家经营。近年的经验证明，发展家庭副业，发展专业户，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物力、财力和具有技术专长的人才。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资源。”文件说得明白，对于从事这类正当经营的农民，必须实行积极扶持的政策，在资金、技术、供销等各方面给以帮助和指导。

总之，对于绝大多数按照党的政策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农民，在政治上要尊重他们，在精神上要鼓励他们，在生产上要帮助他们，对他们的劳动成果，要坚决给以保护。

我国农村开始走向富裕的农民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农村产品不是多了，而是不足。我们要组织农民学习这些先进分子的技术和经验，开辟各种正当的致富之道，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争取能有更多的农民富裕起来。当然，我们同时注意到，确实有极少数农民，不顾国家政策，不执行“三兼顾”原则，投机取巧，损公肥私。对这种违法行为，要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对其巾涉及经济犯罪活动的，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
才，采取师徒带教的方式。各医
科人员，边做边学。各医院
开办营养短训班，让具有
水平、又有长期实践经验
充当教师；在高等医学院中
中，招收适当名额的学生
基础课程后，再专攻有关
必修课程，经考试合格
师。

长远来看，应及早在医院
中设营养系，使其逐步成
为举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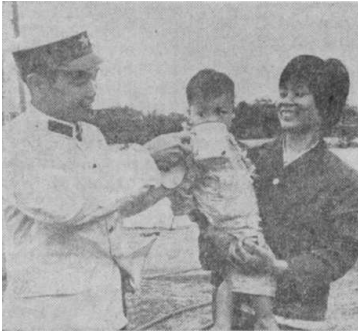
邵阳市中心医院 李瑞芝

奋战在北江抗洪第一线

从12日开始，广东省北部连续降雨13个小时，引起山洪暴发，江河水位上涨，北江两岸各县受灾严重。清远、英德县城顿成泽国，45万群众被洪水围困。

灾害发生后，各级领导干部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积极组织指挥抗洪救灾工作，各行各业从

各方面大力支援灾区，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陆海空军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调动飞机、舰艇，赶到灾区抢救群众和空投食物等。洪水无情害了群众，已基本上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解决了穿衣吃饭问题。



参加抗洪抢险的广州部队海军指战员，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开水送给灾区小孩喝。



5月15日，广州空军某航空运输大队战士向清远县灾区空投饼干和其它救灾物品。杨宇钟摄

(本栏照片系《南方日报》供稿，除署名外均为黄织和摄)

黄冠英坚决反对行贿精神可嘉 马新亮打击报复应当从速查处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金属制品厂财会人员黄冠英，因对本厂党支部书记马新亮违反财经纪律、送礼行贿等问题提出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从1979年10月到1981年9月，被三次解职，两次停发工资。她多次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申诉，恳求调查解决。但是，两年过去了，此案仍拖而未决。

1979年4月，在财经纪律检查中，黄冠英先后两次拿着发票向厂党支部书记马新亮提意见，认为厂里承揽安装汽车装具，随意涨价的做法是错误的。马新亮不仅对黄冠英提意见表示很不满意，而且继续哄抬价格，或以好作次，处理成品，送人情，拉关系。据统计，从1975年到1979年底，他利用这种手段，送给一些领导干部的部分沙发、折椅、泡膜、弹簧、圆桌架等，折合1,590多元。马新亮为了彻底摆脱黄冠英的监督，于1979年10月8

日撤了黄冠英业务开票员的职务，令其到油漆车间当工人。1980年5月，马新亮指使一名副书记，几次催逼黄冠英办理手续，并且再次宣布解除她的职务。黄冠英拒不接受马新亮等人的错误决定，工厂从1980年6月份起开始停发了她的工资。黄冠英被迫上访。6月20日，经盟信访领导小组审定，将案件转请集宁市委查处。但市委仅仅议了议调查组组成人员，查处工作却没有开展。黄冠英不得已又多次到盟上访。

1980年9月24日，以集宁市委为主，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20多天的调查，证明黄冠英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并发现了马新亮有行贿问题。集宁市二轻局党委研究决定：立即恢复黄冠英的工作，补发所有停发工资；要求马新亮端正态度，做好检查。但马新亮既不检查，又不悔改。据此，二轻局党委写材料报告集宁市委，但是市委不作答复，

拖了下来。马新亮见有机可乘，便四处活动，写材料诬告黄冠英“无理取闹，诬陷好人”。

由于市委对问题迟迟不作处理，黄冠英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信访处上访。自治区党委信访处于1981年4月13日，转发了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的批示，盟信访部门及时函告集宁市委，但仍未引起市委重视。1981年5月，黄冠英的爱人从部队转业回山东，她准备随同。在发送档案问题上，马新亮擅自填写非组织鉴定意见，并于同年9月1日第二次宣布黄冠英撤出业务室工作，停发其工资。黄冠英不惧压力，于9月3日再去自治区上访。

乌盟盟委曾召集会议，严肃指出：要立即恢复黄冠英同志的工作，补发所有停发工资；追回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填写的恶意攻击黄冠英的《职工登记表》。并要求集宁市委认真查处此案，速报处理结果。盟信访部门为此曾催办10多次，可是，时至今日，集宁市委仍未查处。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在其中作梗？此案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的正义斗争中，我们相信，这份友谊将继续经得起考验，并不断向前发展。”

萨瓦尔上将是在讲话中指出，巴中友谊有利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他说：“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友好的邻邦，对相互的情况都十分关心。巴中两国人民、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发展。”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迪尔和夫人，大使馆武官应邀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和夫人，副总参谋长徐业德等。

今天上午，萨瓦尔上将一行由刘华清副总理陪同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北京部队装甲兵某部，受到指战员们的热情接待。

杨尚昆会见罗马尼亚总检察长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尚昆今天下午会见了罗马尼亚总检察长尼古拉·波波维奇一行。

胡绩伟欢宴日美客人

本报讯 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日本池贝高斯株式会社社长渡边良雄和美国洛克威尔——高斯公司国际市场董事司徒宁国等先生。他们是专程前来参加人民日报社安装美多罗胶印轮转机竣工仪式的。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等出席了宴会。



◇ 清远县石角公社的干部把省里调拨来的饼干送给受洪水围困的受灾群众充饥。



◇ 前来清远县抗洪抢险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投入抗灾抢险战斗，冒着天黑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妇孺，往安全地带转移。

◇ 海军指战员用登陆艇装运粮食给灾区人民。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上接第一版)

到会同志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许多同志指出，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这是不言而喻的。革命文艺的职能包括通过艺术形象的力量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判定一切文艺都从属于政治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是不符合文艺的历史实践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够科学的。文艺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彼此间相互影响，归根结蒂，都要受经济基础的支配。政治和文艺都不是目的，到头来，都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文艺应当成为用共产主义思想引导人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时代群众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已经被长期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文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是体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根本途径，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创作的初步繁荣，正是文艺工作者密切和群众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有些创作出现了脱离生活胡编乱造的现象，少数同志宣扬文艺要单纯地表现自我，以及文艺工作中的自由化、商品化倾向的产生，这是和某些文艺工作者的严重脱离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类偏向。不少同志认为，文艺家深入生活既要改造主观世界，也要注意吸取创作原料，二者不可偏废，应该统一起来。一般说来，文艺家主观世界的改造，既包括思想感情的内容，又包括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不断提高认识能力的内容。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革命事业的依靠对象。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劳动人民的自我改造割裂开来，看成阶级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是错误的。人人都有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更要注意这种改造。文艺工作者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自觉地在深入群众斗争生活的过程中端正立场，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腐朽思想的腐蚀，进一步

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友好代表团访华全宗荣临时代办举行宴会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全宗荣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友好代表团访华今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贞、区霁寰、郭映福，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明，外交部顾问韩念龙，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瑾应邀出席。许贞祺和乌兰夫先后在宴会上祝酒。他们表示，朝鲜人民的友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今后不管世界上出现什么疾风暴雨，两国人民将作为忠实战友，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薄一波会见美国前财长威廉·米勒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国务委员薄一波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米勒，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参加了会见。

步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要正确地认识新时代，正确地表现新时代，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用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去鼓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艺应当开社会风气之先，成为用共产主义思想引导人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创作既不能夸大矛盾，把生活写得一片灰暗，也不能回避矛盾，搞无冲突论。要勇于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歌颂和肯定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揭露和批判一切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不论歌颂还是批判，都要从生活出发，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有助于人们奋发上进。

“双百”方针要求通过斗争和竞赛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到会的许多同志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发展。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重新贯彻这一方针，大大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由于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资产阶级思想的某种程度的腐蚀，使目前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不能不遇到种种复杂的问题。“双百”方针是要通过斗争和竞赛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如果放弃党的领导，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就要犯右的错误，就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进行思想斗争，如果因出现了错误的东西就怀疑这一方针的正确性，而不再坚持这一方针，就会重蹈“左”的错误的覆辙。不少同志指出，要鼓励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目标下，勇于进行艺术创新和理论探索，允许他们在创新和探索的过程中犯错误，并用正确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切实保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对于一般性的艺术或学术问题，不能把它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

到会的不少同志指出，应当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及其队伍的建设。他们说，毛泽东同志说过“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艺工作不能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和蓬勃发展的文艺创作相比起来，理论批评明显地落后了。与会的同志迫切期望文艺领导部门和各级党委要进一步重视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切实把发展文艺理论批评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出新的努力。

周扬5月12日到会讲话。他指出，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从《讲话》到现在，时代发生了巨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理论要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历史的观点就是发展的观点，不发展就要停滞，而停滞是没有前途的。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也不要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五四”新文艺运动割裂开来。周扬还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当前文艺理论工作的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深入生活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如果作家真正和群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就不会在政治上发生摇摆。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生活中去，不要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要和所描写的生活血肉相连，利害与共。

讨论会结束的时候，陈荒煤代表会议举办单位讲话。他说，这次讨论会开得严肃认真、生动活泼，几代人同聚一堂，各抒己见，共同切磋。大家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表明认真研究《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很重要的，有利于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加强团结，提高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德

——忆张 国 华 同 志

樊近真

1972年2月20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张国华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聚精会神地听汇报。会议是接着上午开的，发言很激烈。当张国华同志发言时，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他服了点药，不顾别人的阻劝，又坚持继续发言，后来就倒在了会场上。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打了几针之后，出现了严重呕吐，就在当天夜里，张国华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正象他平时说的那样，“我不愿躺在床上呻吟，只有战场才是我的归宿。”

他离去的这样猝然，竟来不及把外地的孩子们叫到身边。但是，他却把最宝贵的财产——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一)

在张国华同志逝世前几天，我听到他在秘书的办公室里唱《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这首歌，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当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歌声更加有力，至今仍然萦回在我的耳边。

张国华同志是江西省新建县人。1929年3月，他刚15岁，由于受到当时土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建县西北特委领导的游击队。1931年3月，他在红四军正式转为共产党员。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在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又从陕北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华北转战华中、华东东打到东西南，解放后又从四川到了西藏高原。环境再艰苦，工作再困难，他从未讲过条件，一切听从党的指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0年4月，张国华同志奉率领部队到苏鲁豫皖地区（后改名湘西地区）接防，任115师教导四旅政治委员兼湘西地区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由于“委托”事件造成的极度复杂的环境下，很快打开了局面，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组织上批准了张国华同志去延安学习的要求。这对长期远离上级领导，单独在一个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张国华同志来说，确是实在太难得了。他高高兴兴地交了工作，启程奔赴延安。途经太行山根据地，他向八路军前方总部汇报了工作，当他已经到达太行二分区，准备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突然接到总部打来的电报，要他立即返回冀鲁豫四分区（现河南省安阳滑县、濮阳、内黄、汤阴一带）工作。当时，该地区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自然灾害又异常严重，群众生活十分艰难，斗争尖锐复杂。张国华同志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毅然放弃渴望已久的学习机会，立即返回冀鲁豫四分区，继续坚持前方的艰苦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50年初，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张国华同志奉命率领18军进驻川南，大批部队干部转入地方工作，张国华同志也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不久，18军接受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同志们经过长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一听又要进藏，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某些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包括少数负责干部，思想很不通。加上西藏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给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转入执行解放西藏、保卫边防的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张国华同志作为18军军长、军党委书记，感到肩头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及其影响，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建设和巩固国

防，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18军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直接领导下，开始着手研究实施方案，进行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准备工作。张国华同志的扁桃体经常发炎，为适应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他坚决割去了扁桃体，六天六夜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经受了很大的痛苦。

当时，我刚刚从河南到四川工作，同他久别重逢，而且即将分晓，多么希望生活能够安定下来，有机会学习一些我所喜欢的银行专业知识。就在这时，我们的大女儿又因病死去了。而张国华同志仍为准备进军西藏日夜奔忙。他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计较个人利益的，到西藏那样艰苦的地方去，困难肯定是很多的，但党的事业需要你，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去。我被他说服了，拖着刚刚分晓20多天的虚弱身体，和他并肩踏上了挺进西藏的长途。我们战友们一道，翻越了19座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高山，过了几十条寒冷刺骨的冰川、激流，穿越了许多原始森林和泥沼的沼泽地带，经历了千辛万苦，战胜了高原缺氧、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餐风饮露，终于在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

(二)

张国华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很强。他对待革命工作严肃认真，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的火一般的热情，艰苦的作风，深深感染和激励着周围的同志。

1946年11月，张国华同志被调去开辟豫皖苏地区的工作，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在复杂艰险的环境里指挥部队连续作战。豫皖苏地区是一个没有后方、孤悬敌后的游击区，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剿”，妄图拔除插入他们心脏的“匕首”。张国华同志刚刚由政治工作转为军事工作，肩上的担子很繁重。我到他那里，常常看到他紧锁双眉，全神贯注地阅读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思考和研究如何贯彻实施中央的意图。我眼看他彻夜不眠，不思饮食，眼窝深陷，脸也浮肿了，既心痛又担心。我劝他注意身体，他先是不理睬，等我说得多了，他总是那么一句话：“共产党员嘛，要对党负责。”由于豫皖苏地区党委承认镇级并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和战术思想，战局迅速扭转了，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张国华同志一生中，有17年是在西藏高原度过的。毛主席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邓小平同志指示：“到西藏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惑，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广大的人口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家庭下来”。张国华同志深知责任的重大，不敢有半点懈怠，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接受进藏任务后，他立即派先遣人员，深入西康地区搜集政治、军事情况，调查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亲自到成都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军党委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印发部队，进行民族、宗教政策教育。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他在行军途中，同大家一样不进寺庙，不住民

房，宁肯露宿在冰冻的雪地。部队进驻拉萨之后，一小撮亲帝主义分裂分子妄图将我们“饿死”，张国华同志和谭冠三政委亲自率领部队开荒生产，很快扭转了粮食、蔬菜补给困难的局面。为了发展和壮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张国华同志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西藏的各阶层人士，甚至十次、几十次地亲自登门拜访，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民族的关怀和期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西藏工作的岁月里，他常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他常说，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人民交给我的工作，我完不成没有办法向党向人民交代。

1952年6月的一天深夜，我正在西藏人民银行开会，张国华同志的警卫员突然来叫我：“谭政委让你马上回去，司令员病重。”等我赶回去才知道，张国华同志因疲劳过度体克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治疗和休息，直到黎明才恢复过来。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张国华同志长期在西藏高原忘我地工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67年，当他离开西藏时，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损伤。

张国华同志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战争年代，他的上衣口袋里也经常装着一本小字典。他把重要文件和书籍都装在小马褂子里，随身带着南征北战。每逢中央发来文件和指示，他总是认真学习、思考，联系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为了进藏后之便于开展工作，他在进藏途中就开始带头学习藏文，工作再忙也坚持听课。他在几个小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抄满了藏文，有空就拿起来读上几句。他到西藏不久，就可以用藏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了。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讲起话来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使人难以相信他竟然是个只读过四年半私塾的农民家庭出身的领导干部。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张国华同志既有军队工作的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他既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身经百战，多谋善断，指挥过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和战斗；工作有魄力，有干劲，头脑清醒，踏实稳重，深得老一辈革命家的器重和培养，也深受同志们的爱戴。

(三)

张国华同志襟怀坦白，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共产党员。张国华同志一向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不炫耀过去，居功自傲。在冀鲁豫四分区时，有一次部队打到了肤施，张国华同志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庆祝胜利。一位战士说起快板书，颂扬张国华同志指挥果断，他刚刚听了几句，就起身离开了。1962年保卫祖国边防的战争胜利之后，党中央要张国华同志到北京汇报，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首长这次要进德胜门了，张国华同志当即纠正说，你想的是进德胜门，我却想的是出宣武门。

张国华同志勇于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有时甚至使人感到近乎苛求。他年轻时比较自负，作风有时也不够民主。随着他政治上的逐渐成熟，这些缺点得到很大的克服，尽管这样，他仍然不断警惕自己，要求身边的同志提醒他注意，以免影响党的工作。他作工作总结和写自传，从不提

他把一切献给了党

——记党的的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金龙浩

邢万生 刘华礼

山上的同志团团围住老局长，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金龙浩毫不顾惜自己的病体，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在他病逝前一年里，他曾四次登上长白山峰顶。就在他病重住院的头一天，他还强挺着病体坐在颠簸的卡车上，去农村为职工拉冬储菜。

“我有责任为国家分忧”

当金龙浩遭磨难的时候，老伴和孩子们不得不东拼凑钱，熬过漫长的日子，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他的老伴还是靠亲靠友，凑钱为老伴就医的老金浩说。到金龙浩平反时，攒下的医疗费单据就有1,200多元。

当州里有关领导同志向他征求核销这笔医疗费的意见时，金龙浩诚挚地说：“这些年我吃了不少苦，家里也很穷，但比起咱们国家这些年的损失来，就不值得提了。国家现在困难，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为国家分忧。”他说服了老伴和孩子，毅然决定，应报的医疗费不报了。

1980年调整工资，局领导有一个名额。不少同志认为金龙浩应该涨一级。金龙浩多次要求同志们不要提他。他说服大家，下次向上级写了报告，把这一级让给了局长张连元工程师。

在成立州市气象党组前，上级有关部门考虑金龙浩年龄长，有工作经验，准备让他担任党组书记。金龙浩听说后，马上找上级领导说明自己是外行，身体也不好，让张连元同志有专长、懂业务，在气象局这个业务性很强的部门，由他担任党组

自己的作用和功绩，总是认真地总结教训，检讨自己。

张国华同志在干部问题上坚持搞五湖四海，从不有亲有疏，拉圈子，搞宗派。他很重视自己部队与友邻部队的团结，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的团结，总是亲者严，疏者宽。他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在教导四旅期间，特别注意关心和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进藏时，部队来自西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他教育18军的干部要尊重西北的干部，动员他们准备在会后任副职。他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结合，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注意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他十分注意汉族干部的团结，“老西藏”和“新西藏”的团结，尤其关心藏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西藏中的特殊作用。

对犯有过失或犯过错误的干部，张国华同志既严肃地批评教育，又不嫌弃，使他们感到同志般的关心和帮助。在豫皖苏工作期间，一位宣传工作人员因工作调动问题同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争执起来，对组织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事后，张国华同志找他谈话，一面严肃地批评，一面又耐心地帮助他具体分析错误的原因，告诉他怎么做才对，使他心悅诚服。这个同志在1949年南下时，因病留在南京做某一部门的领导工作，当他得知18军进藏的消息后，坚决向组织要求，带病随张国华同志挺进西藏高原。许多在张国华同志领导下的同志，都感到张国华同志不仅是一个“严而不畏”、“亲而不俗”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知心朋友，都乐于同他共事。

张国华同志待人谦和、宽厚，但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不让步，不姑息。淮海战役后，部队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情绪，出现了一些违犯政策和纪律的现象。某集团参谋长在河南开封车站打骂过群众，事情被揭发出来时，部队已经到了江西，张国华同志仍责令军政治部的同志带着那个副参谋长返回开封，向群众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通报全军，引以为戒。成都战役后，个别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犯了错误，张国华同志和军党委进行了严肃处理，坚决抵制了在胜利形势下滋长的享乐思想。

1967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找张国华同志谈话，告诉他，经毛主席同意，决定调他到四川工作。在四川工作的几年中，张国华同志的处境十分困难，身体、“四人帮”一伙打击他、诬陷他，甚至从肉体上摧残他，然而，张国华同志在淫威面前并不屈服。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从不任我们面前发一句怨言，而是尽自己的所能，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他工作极度紧张，有时发高烧也不休息。我曾提醒他：他忙他们是要把你整死的。他说：“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只要党的事业在。”他希望他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他的处境，他沉默很久才慢慢地说：“总理都知道。他够忙的了，你知道总理的困难吗？千万别再给总理增加麻烦了。”看到他严肃的表情，我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

张国华同志逝世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成都，指示把张国华同志的骨灰送到北京。周总理和刘少奇、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到机场迎接张国华同志的骨灰。看到总理的热泪顺着他那削瘦的面颊流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紧握住总理的双手，眼泪象泉水夺眶而出。

张国华同志的一位战友写了这样几句诗悼念他：“枪林弹雨见英姿，光明磊落是模范，抱病革命唯尽瘁，倚床工作不知倦。”张国华的一生，自有党和人民来评价。作为与他共同生活和战斗过几十年的革命伴侣，我只是记下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些片断，激励我和子女们更好地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并借以寄托我的思念。



之症——胃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0月31日，是金龙浩作探查手术、发现癌已扩散到整个肝脏，无法施行切除手术了。金龙浩凭他多年公安工作的敏感，判定自己得了癌症。这时，他反而很坦然。生与死，他早已想过了。他从18岁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他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死在医院里。他有个强烈的欲望，想回到办公室去看看那压在玻璃板下的《准则》，他要用它最后对照检查一下自己；想到各科室走走，看看同志们近来的情况怎样；想到后厨去看看，托儿所办起来没有……

遗憾的是，这些都不及办了，他已经不能下床了！

老金想：“我再不能为党工作了，对培养教育自己成长起来的，还能献出点什么？”他想到了自己的遗体。对，把点什么交给党，交给医学院解剖用吧，为青年学生们留下个标本也好。”

一天，他对终日守护床前的老伴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反复说服老伴。他还谈到：“我死后，家里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千万不要找组织麻烦！有两笔账，一定要及早还给国家，一是冬季取暖煤没扣交的款，再就是局里领导看望我时带来的那条中华香烟钱。告诉医院，不要在我身上用好药了。好药留给那些更需要它的同志吧！”

12月2日，金龙浩病势沉重，省气象局负责同志专程赶来延吉看望。金龙浩同志郑重地向组织提出自己的遗言：一、丧事要从简；二、遗体交给医学院做医学解剖用。

12月17日晚6点27分，人民的好儿子、党的朝鲜族好干部金龙浩静静地走了。金龙浩同志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的有限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死不着》新版序

萧三

一篇作品《王九诉苦》开始，就以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朴素的群众语言，亲切的民族风格，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首诗真挚地、形象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

的社会风貌和那个时代的斗争的一个侧面。

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

孙老财一手把天地盖，穷小子死了没处理。

孙老财的瓦房前院后院，穷小子光着屁股串房檐。

孙老财的陈米生了虫儿，穷小子菜粥锅里照人影。

孙老财街上蹶一蹶脚，孙家村的树枝儿插几插。

孙老财的算盘劈劈打，算光了一家又一家。

这些形象有力的诗句，把解放前贫苦农民受封建压迫与剥削的惨痛遭遇，刻画入微。

诗中人物栩栩如生；作为这些人物背景的又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这就是他的诗所以感人至深的原因之一。

《王九诉苦》一诗可说是那时群众所谈到的反映土地改革和农民斗争的湖，绿的树，在那绿影子一般的平原上，麦苗儿拔节，燕剪儿穿风……这一切把我的心也染绿了，浑身洋溢着萌发的希望！

快把我搬进这黑色的沃土里，我要发芽——不论在肥沃的良田，还是贫瘠的土壤。

此刻，我的生命啊，也正是早春时光！

志民同志在运用人民群众语言和民族传统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不僵硬，不造作，来得自然，熨帖，如在《接喜报》一诗中，作者写王大姐对于丈夫五十天无音讯的猜测时，连用了几个“莫不是……”和一连几个“敢是……”的写法，

都是我国民族传统手法，这里运用得当，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作者把哲理化为形象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内涵，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而后，他随着自己生活的脚步，又写了《金玉记》、《社里的人物》、《村风》、《西行剪影》、《红娘颂》等诗。这些诗，前后彼此都是有联系的。它保持并发展了自己的风格。

志民同志写出这些作品不是偶然的。他在农村度过艰苦的童年，幼小参加革命，在党的教育下，长期生活在斗争的

第一线，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对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得之在我，积之在平日”。生活哺育了诗人，诗人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为《死不着》写序言，我想再一次强调生活的重要。它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切创作之本。

他的新诗也完全符合鲁迅论新诗的指导：“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志民同志的诗作，这些特点兼而有之。

历史在前进，生活在前进，希望志民同志和生活在他的时代以及更多年轻的同志写出更多的好诗。

1981年10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于北京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萧三

照相、摘花及其它

舒展

听一位老同志讲，她在新四军当记者时，很向往有一架照相机，可当时全军仅有一架，还掌握在张爱萍同志那里。那时要照个相可不容易了。

现在呢，有一个团竟有照相机好几架，甚至有的连队也拿副业生产收入买上一架“照相机”。从近年来各地摄影热的兴起，说明了“三全”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需求。

不爱照相的人大约不多吧？但也有。比如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就不爱照相。一些老摄影记者大约还记得，不管你去哪里缠着彭老总要求给他照相，唉——那算没门儿！他说：“要照相，照那些流血流汗的英雄嘛，照我干什么？我这个人脸长得丑。”不爱照相，无关宏旨，但这却有力地表明，彭总对突出个人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反感。

我绝不爱观赏爱照相者之意。年轻人爱照相，是爱生活、爱青春、爱艺术、爱美的高尚情趣的表现。不仅无可厚非，有条件还应提倡。

但是可惜，在这种文明行为中却有的人表现得那么文明。例如有的青年人爬到故宫的铜狮上照相，可伶怜只细长腿的珍贵文物，它受得了吗？又如有的年轻人喜爱公园万紫千红的春色，却攀摘几枝花木棒在手中，对准照相机留下一个（不文明的）纪念。

一位颐和园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讲了一个战士攀摘花木的小故事。这位战士因公路过北京，时值桂花飘香，便顺手摘了一枝，恰被公园管理人员发现，除进行批评外，还要罚款五元，好说歹说，姑念不知规章，态度良好，就此拉倒。谁知这件事让团长知道了，他越出卷之便，立即到颐和园，自己掏出五元钱，代表违章战士作了诚恳检讨，承担了教育不力的责任。这位团长还要求把那位已经枯萎的桂花给他带回部队，作为对指战员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一个教材。这位团长对战士的爱护，是难能可贵；对战士的批评，也不是偏激过头。好，有学问！

当团长用惋惜、责备、深情的眼光，将这枝枯萎的桂花送到含羞、垂头、内疚的那位战士手中时，我想，若有哪个摄影爱好者把那个镜头拍下来，该多有意思。

爱兵向来是我军指挥员的美德。怎么爱法？大有讲究。软弱涣散，骄纵放任不行；那么抓住什么典型来“点名照相”，猛夸一顿就好呢？也不照行。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行。良好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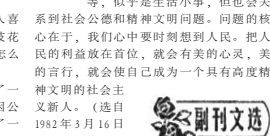
令人景仰的彭总，是伟大人民的伟儿子（见彭总《致巴金的信》）。这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照相与摘花等，似乎是生活小事，但也会关涉到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心中要时刻想到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就会有美的心灵，美的言行，就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选自1982年3月16日《解放军报》）

在当前打击犯罪活动中，有相当一批犯罪者幡然悔悟，弃旧图新；但也仍有“落水者”尚存侥幸心理。

柳宗元在《哀溺文》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永州人善游泳。一天河水暴涨，有五个人乘小船横渡湘水。船到中流就溺了，只好弃船游泳。其中一人使尽力气也游不远。他的伙伴问他：“你最善于游泳了，今天为什么落在后边？”这个人说：“我腰上有一千钱，太重，所以落后了。”他的同伴说：“为什么还不丢掉？”这个人回答说：“只是怕丢。过了一会，他越游越没有力气。已经上岸的人站在岸上呼喊：“你实在太糊涂了。你都快死了，还要钱干什么？”那个人还是摇头，于是就淹死了。

柳宗元“哀溺”自有道理。落水者如果丢掉金钱，听从劝告，完全可以得生；由于他利令智昏，善游者终于变为溺死鬼。对这个永州人是历史的悲剧，对今日经济领域的落水者却是现实的警戒。

今日某些“落水者”迟迟不肯主动认罪，除有的是对党关于主动坦白从宽处理的政策将信将疑之外，相当一部分就是妄图瞒天过海，日后继续挥霍这些“不义之财”。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仅是开始，斗争还要继续深入。不早日自首悔过，赃款这个“死神”就会把自己拖入绝境。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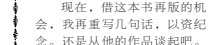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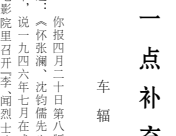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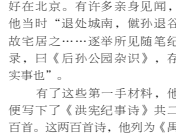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

舒展